


*Kexue De Zhexue Jiedu Yu
Xifang Zhexue De Zhishulun Chuantong*



科学的哲学解读与 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

宋宽锋/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哲学理论创新与发展丛书

科学的哲学解读与 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

宋宽锋/著

责任编辑:毕于慧 徐林香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王春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的哲学解读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宋宽锋 著.—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5790-0

I. ①科… II. ①宋… III. ①西方哲学—知识论 IV. ①B5②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192 号

科学的哲学解读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

KEXUE DE ZHEXUE JIEDU YU XIFANG ZHIXUE DE ZHISHILUN CHUANTONG

宋宽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59 千字

ISBN 978-7-01-015790-0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完整版本,原来的题目是“基础与意义——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与科学”,现在改为“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第二部分是对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历史发展的一个简要梳理、分析和反思,相当于“西方知识论和认识论简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透视和前瞻;第三部分则收录了发表过的三篇相关论文。

三个部分的内容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内在关联。一方面,知识论乃是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探究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的一个主要维度及其理论表现;另一方面,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又成为我们把握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的一个背景框架。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实质上就是从两个有所差异的视角或侧面对西方哲学及其演进理路的梳理和阐释,两者之间具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另外,“附录”中的“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西方哲学解读的一个基本视角”一文,相当于第一部分前八章内容的一个简明版本。“感觉与理智之关系的希腊观念”一文,是对西方哲学认识论史中的一个较为有趣的理论问题的智性考察;“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探究的知识论前提”一文,则是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或者一个拓展性的研究成果。

第一部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不是对哲学与科学之间实际发生的相互影响的一个历史考察,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对西方哲学与

科学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影响的事实性研究。在我们的理解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对于西方哲学而言,乃是一个内部问题,而不是一个外部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尤其是对于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而言,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的思考和解答,是哲学的自我理解、自我定位和理论建构的前提;反过来,哲学家通常也主要是从哲学的自我理解、自我定位和理论建构的视角,来思考和解答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追问和思考哲学与科学之关系是如何问题化的,对于哲学研究而言它是如何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基础性的问题的,尤其是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家是如何思考和解答这个问题的,而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又是怎样影响和限定着其哲学观及其理论建构的理路的,等等,就成为我们把握和解读西方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视角。从这一基本视角来透视西方哲学,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个是学科化的哲学观念,即把哲学理解为区别于各门具体科学或学科的一门学科,而且是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式和研究旨趣的一门学科。与此相一致,习惯于从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来理解哲学自身,或者说,把相应的科学或学科门类看作哲学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的最为重要的参照系,乃是西方哲学所表现出的另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

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无疑是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就我国哲学界对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而言,要切近地把握西方知识论的内容和特质,我们还有必要进行一些前提性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澄清的工作。我们知道,英文中有“epistemology”和“theory of knowledge”两个概念或表述,国内哲学界习惯上大多是把“epistemology”译为“认识论”,而把“theory of knowledge”译为“知识论”。比如,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和约翰·波洛克的《当代知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中译者都是这么翻译的。这样一来,在中译本之中,我们就看到了“认识论”和“知识论”两个表述交替出现的现象,而对于不太熟悉这一研究领域的读者来说,很可能产生迷惑不解或者莫名其妙的感觉。当然,造成

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这些著作的原作者常常是不加区别地使用“epistemology”和“theory of knowledge”两个概念。这种不加区别地交替使用这两个表述的现象在英文著作中相当普遍,比如,Routledge 已经出到第三版的一本名为“*Epistemology*”的书,其副标题却是:“*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①而如果我们习惯性地将其书名译为《认识论:当代知识论导论》,则易于使人产生几分荒谬的感觉。实际上,在英文著述中,大多数情况下“epistemology”和“theory of knowledge”乃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两个同义词。同时,就西方哲学界对“epistemology”或“theory of knowledge”的主流理解来看,将这两个表述统一译为“知识论”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乃是知识的辩护(justification)问题,而不是认识的发生学问题。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一种相对并非主流的对“epistemology”的理解,即把认识的发生学研究作为“epistemology”的主要问题域。比如,蒯因所提出的“naturalized epistemology”和皮亚杰所创立的“genetic epistemology”,就是这种理解的两个代表性的例证。与此相关,如果将这里的“epistemology”还是译为“知识论”,则显得不太恰当。还有,就是在西方哲学的演进历程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对认识 and 知识问题的哲学研究中,认识的发生学研究 with 知识的辩护问题研究通常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两方面问题的研究也常常呈现出相互影响的现象。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曾主张把认识的发生学研究界定为“认识论”,而把知识的辩护问题的研究称作“知识论”,^②相应地我们也把主要致力于认识的发生学研究的“epistemology”译为“认识论”。在本书中,我们大致也是这么做的。

或许正是由于在西方哲学自身之中就存在着对“epistemology”的两种不同理解和规定,我国哲学界在对西方的“epistemology”以及“epistemology”本身的研究历程中,也相应地一直存在着两种有所不同或侧重有异的理解。

① Robert Audi,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② 黄颂杰、宋宽锋:《对知识的追求和辩护——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历史反思》,《复旦学报》1997年第4期。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一代中国哲学家之中,在“epistemology”的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两位哲学家是张东荪和金岳霖,金岳霖的《知识论》更为注重的无疑是知识的辩护问题,而张东荪的《认识论》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认识的多元论”则相对而言较为关注认识的发生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论”是我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此时期的认识论研究主要关注的乃是认识的发生学问题;与此相联系,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的中译本,也许就是对此时期的认识论研究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一本书。^①但在此认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国内哲学界对于西方知识论的主流形态及其理论特质则显得日益隔膜。1997年或许是这一状况得到逐步改变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一年,胡军教授出版了《知识论引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书,陈嘉明教授在本年度《哲学动态》的第6、7期上,连续发表了《西方的知识论研究概况》一文。两位教授的大作根本上都摆脱了在此前国内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认识论”观念,而切近了西方哲学的主流知识论形态。^②在此之后,陈嘉明教授2003年出版的《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徐向东教授2006年出版的《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则进一步推进了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理解和认识。近些年来,相继出版的多本研究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博士论文,更使我国哲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大为改观。

目前,在笔者看来,有关“知识论”和“认识论”的研究,似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更为深入的讨论。第一,就是传统上隶属于哲学的“认识论”的性质及其出路的问题。对此,我们曾经认为,对“认识的发生问题”的经验科学研究将取代传统的“哲学认识论”;与此相一致,传统的“哲学认识论”也将被哲学本身所否弃。现在回头来看,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的学术界,确实没有人还在以前科学的思辨方式来研究“认识

① 参见[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虽然在此之前,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两本能够代表西方的主流知识论形态的著作(1.齐硕姆:《知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2.丹西:《当代认识论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但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论”。但是,着重研究认识的发生问题的认知科学却成为国内哲学界近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认知科学隶属于哲学吗?或者说,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吗?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许有学者会说,认知科学有其哲学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认知科学的研究本身也会激发知识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等方面的思考和理论探索。^①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与此相一致,我们当然可以说,物理学有其哲学的前提和基础,物理学研究的进展也会激发出哲学探究的新问题和新灵感。然而,正像与物理学相联系的这些方面的探讨理应属于“物理学的哲学”一样,与认知科学相联系的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应该属于“认知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而不是属于“认知科学”本身。第二,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之理论出路问题,也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省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给予这样的回答:哲学研究理应扬弃西方传统的知识论,超越其辩护的旨趣,并由辩护走向理解。^② 不过,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知道,在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的演进中,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诠释学、实用主义、后期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都曾对知识论以至知识论的哲学范型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批判性解读,其中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杜威、维特根斯坦、福柯、罗蒂的相关解构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从知识论的理论出路和形态更新的角度,来梳理和反思对知识论范型之哲学的诸多批判性解读,依然有其必要性和较大的理论探索空间。第三,以对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之理论特质的切近把握为前提和基础,来重释和重写“西方知识论史”,也有其显而易见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国内已有的关于“西方知识论史”的几本研究著作,都是在1997年之前出版的,也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侧重认识的发生学研究的“认识论”观念的影响,而其书名也无一例外地叫作“西方认识论(简)史(稿)”,而不是“西方知识论史”。

本书所收录的篇章,其主体内容是笔者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① 刘晓力:《当代哲学如何面对认知科学的意识难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 黄颂杰、宋宽锋:《再论知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出路》,《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

所完成的。从2003年至今,笔者一直致力于中西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很少用心思考本书所关注的论题,这次因应特殊的机缘而整理、修改旧稿,笔者也查阅了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书稿进行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正完善。而在查阅资料和校改稿子的过程中,也有些许未曾预想的认识和体会。从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的视角解读西方哲学的文章依然极其少见,笔者用“哲学与科学”的主题词在知网的期刊单库查询到的少量文章中,关涉这一主题探究的文章在十篇以内,而在其中却发现两篇论文明显抄袭“附录一”的文章,有一篇竟然一字未改地复制了笔者论文的正标题、摘要、文中的标题和部分内容。再就是,当我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而能以较为中立的态度来审视本书书稿的时候,也常回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所走过的路途,而每当这时候,一丝悲凉就从心底悄然升起,无法回避。

前 言 1

上 篇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问题的历史发生 11

 一、从希腊的哲学探究到近代科学的产生 11

 二、哲学与科学在近代的分化及其结果 24

第三章 先验主义的哲学构想和科学 33

 一、哲学与科学的区分以及未来形而上学的构想 35

 二、辩护、基础和规范——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经典模式 41

第四章 思辨哲学与科学 47

 一、思辨哲学——一种超级科学 47

 二、思辨哲学视野中的科学 51

第五章 先验现象学与科学	55
一、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追求和建构	55
二、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	60
第六章 存在之思与科技之问	66
一、基础本体论的建构与科学	66
二、科学与技术的本质之思	71
第七章 哲学诠释学与科学	77
一、精神科学的合法性和哲学诠释学	77
二、哲学诠释学和自然科学	81
第八章 分析哲学与科学	86
一、前期分析哲学的基本立场	86
二、批判和质疑	94
第九章 回顾和前提性辨析	103
一、“科学”概念的歧义性及其反思	103
二、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和联系的概略说明	108
第十章 知识论——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基础主义理解	112
一、知识论的理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112
二、对知识论的批判和反思	120
第十一章 科学的本体论前提和生存论基础	126
一、反思科学的本体论前提的方式和意义	126
二、科学的生存论基础和属人意义	132

下 篇

西方哲学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反思与前瞻

第十二章 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初步界说	141
第十三章 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探究的古代形态	145
一、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与知识论探究的发端	145
二、古希腊哲学中的知识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探究	149
第十四章 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经典形态	159
一、近代认识论和知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	159
二、经验论的认识论和知识论	162
三、唯理论的认识论和知识论	169
四、康德的知识论	174
第十五章 知识论的现代发展和对知识论传统的现代批判	180
一、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知识论	181
二、前期分析哲学与知识论	183
三、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探究与伽达默尔对知识论的 批判扬弃	186
四、后期分析哲学及其他现代哲学流派对知识论的批判	192
第十六章 科学哲学:知识论和认识论的晚近形态	198
一、科学合理性的逻辑主义探究	199
二、科学合理性的历史主义重建	202
三、从历史主义到相对主义	206

第十七章 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理论出路前瞻	210
一、认识论与知识论的区分及认识论的本质转换	210
二、知识论的本质透视与知识论的扬弃	217

附 录

附录一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	227
——西方哲学解读的一个基本视角	
附录二 感觉与理智之关系的希腊观念	242
附录三 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探究的知识论前提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65

【5/17/2020】

上 篇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

第一章 导 论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它是一个老问题,不仅是因为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而且也因为哲学界内外的人们对此问题似乎都颇为熟悉。但熟知并不等于理解,更不等同于人们对该问题已有一个深刻的思考和明晰的见解,当然,也不意味着该问题的答案已足够明白而无庸争辩。事实上,当我们试图去规定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看似自明的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不仅有根有据的答案不易得到,就是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规定和处理方式也会多有不同。同时,该问题不仅是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不得不加以思考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而且,即便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游戏和后现代科学的构想之中,该问题也依然存在。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只要哲学还未走向消亡,只要作为科学或至少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观念还未被抛弃,那么,该问题就必然会存在,并会被人们所讨论。所以,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常新的问题。

需要研究的问题一旦确定,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具体分析该问题所蕴含的不同理论层面及其可能的不同研究方式,然后,在辨析、厘定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就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而言,我们至少可以在理论层面和事实层面上来分别规定和思考它。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又都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研究和立足于当代的考察这两个向度,虽然它们彼此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可以绝对地划定的。就事实层面的研究而言,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既可以表现为对历史上产生的特定的哲学学说、

命题和概念与特定的科学理论、命题和概念之间实际发生的历史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考辨,也可以表现为对当代的某一哲学学说、命题和概念与当代的某一科学理论、命题和概念之实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分析。当然,这种事实研究也会引导研究者去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观点,但是,在这里事实研究本身无疑是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实际上,这种事实研究的困难并不在于理论研究和事实研究的区分是否能够成立,而是在于这种事实研究本身必须先行承诺的理论观念,对于该论题而言是很难成立的。我们知道,这种事实研究要得以可能,它就必须先行地接受和确定一种哲学观和科学观,一种哲学和科学之间严格的划界标准。但是,在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哲学和科学本身都是历史地演变着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哲学范型之中,哲学和科学所获得的规定和内涵也是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的;与此相联系,我们也不可能发现一个具有普遍的可公度性的划界标准。而如果承认这样的事实,那么,这种事实研究的可能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当然,研究者还是可以从自己所认定和接受的特定哲学观和科学观出发,去剥离和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但这种对历史性实存的人为切割必然会使这种事实研究失去其本身所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认定了特定的哲学观和科学观,就等于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个先行的领悟和解答,而从此出发的事实研究最终只能成为对研究者先入为主的理论成见的说明和佐证。而如果一个研究者试图从哲学和科学的历史性实存出发,并在尊重历史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认识的前提下来开展自己的研究,那么,他就必然会走向问题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能是一种观念史的考察。作为观念史性质的考察,它理应隶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理论研究。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来看,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内在地蕴含着对该问题的观念史性质的考察和直接的理论论说这样两个向度。而对于该问题直接的理论论说如果脱离开对该问题的观念史的考察,无疑将是单薄和肤浅的;反过来看,问题史的考察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指向理论上的思考和论说,所以,问题史的考察和对问题的理论论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因为问题史的考察不可避免地都是从研究者自己所具有的特定视域